

长三角一体化 环太湖共筑社会治理共同体

□ 李迪 应南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在深入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环太湖地区“两省五市”以共建环太湖社会治理共同体为抓手,探索开创具有区域特色的社会治理工作新局面,在深入推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进程中走在前、作示范。

建设环太湖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现实需求

环太湖地区“两省五市”的自然地域特性和行政区划现状,在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上遭遇在地治理与扩展治理间的政策制度差异、资源禀赋匹配、利益冲突等瓶颈与障碍。对照长三角一体化的总体要求,依据京津冀、粤港澳等区域的社会治理经验,促成跨区域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区域内多个主体协同发力,促成治理资源与要素的合理配置,建议从跨区域社会治理的资源匹配、数据要素整合、多元主体参与等多方面持续推进。

需要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的整体合作效能。目前,环太湖五市对各自市域范围内县、乡、村社会治理阵地的初步整合,已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的基层治理模式。但不同市域间主要沿袭属地管理原则,治理力量与资源倾向于本土化配置与调配,缺乏

协同参与的治理平台,易形成避责自保应对思维,亟需打破地域性限制,持续构建开放、协同的网络化治理体系,提升环太湖社会治理效能。

进一步促进社会治理的数据要素整合。随着社会治理数字化智能化日益深入,环太湖五市持续加大对社会治理的资金投入,依托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5G技术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提升数字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但不同城市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资源、企业创新等方面的差异,导致数字技术难以融入社会治理实践,形成区域层面的“数字鸿沟”现象。统筹好、调配好、配置好面向基层社会的治理数据要素与数据资源是建设环太湖社会治理共同体亟待破解的重要问题,也是推进长三角社会治理一体化的关键抓手,关系着环太湖跨区域治理效能的整体提升。

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参与。环太湖治理存在治理主体错位、缺位,部分基层职能部门以自我为中心,习惯以行政命令等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包揽一切社会事务,认为居民、社会组织、乡贤、业主等多元主体是被管理对象,而不是平等参与治理的生力军,导致相关诉求被边缘化、虚化,未能充分发挥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的社会组织、居民自治组织两股力量。缺乏切实有效激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工作机制,使得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不强,存在“干部干、群众看”现象。

建设环太湖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推进路径

坚持党建引领,增强统领能力。健全党委领导下的环太湖社会治理的协调机制,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治理的全过程、各领域,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创新与发展区域党建、毗邻党建为抓手,充分发挥党建的政治引领、思想引领、组织引领、价值引领功能,紧密联动环太湖五市社会治理行动,统筹协调、有序组织区域各项治理要素与资源,形成清晰的“路线图”、明确的“施工表”,强化主体责任落实。将权力置于法治的框架内,构建开放、透明、协同的现代治理体系,通过程序正义解决利益冲突,避免权力任性。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等容错机制,为基层干部提供合法免责路径,减少避责行为。

强化技术赋能,夯实数据要素基础。数字技术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为破解环太湖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数字鸿沟”,需要依托环太湖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蓬勃发展的新优势,围绕基层公共服务、平安创建、民主协商、城市管理、民生保障等治理内容,推动数字技术深度耦合,发挥数字技术在功能集合、资源整合、力量聚合、治理综合中的积极作用,着力构建环太湖大数据赋能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数字化、

智能化与精细化,在大数据赋能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促进共建共享,夯实社会基础。治理社会化是共同体的本质要求,共建环太湖社会治理共同体既要发挥党委政府的领导作用,又要关注多元社会力量的有机参与,确保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秩序与活力的统一。持续凝聚多元社会治理力量,支持各类专业化、社会化治理主体发展,畅通多元治理力量参与环太湖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行进通道。有序推动社会组织、社会企业、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的有机联动,鼓励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加入社会治理环节,充实社会治理主体力量,提升社会治理专业优势。探索实施公益创投、项目承包的社会治理合作模式,柔性培育各类型治理力量,为环太湖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创新构建环太湖社会治理新格局,优化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治理主体的协同方式与内容,建立健全协商议事、民主决策、监督评价、集体行动等的流程机制。扩宽共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在社区与村居、城市与乡村的建设路径,深化党建引领、数字赋能,三治融合创新实践,不断推进治理共同体融入养老托育、社会救助、公益服务等新兴生活场景,让群众可感可及,增强环太湖社会治理的群众基础。

(李迪系中共平湖市委党校副教授;应南亮系中共平湖市委党校助理讲师)

□ 杜南岚

极端天气频发、生态系统退化、海平面上升等问题的不断加剧,迫使各国重新审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与环境保护之间的深层矛盾。传统经济模式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结构短期内难以彻底改变,钢铁、化工、交通等高碳行业既是经济增长的支柱,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导致减排行动常陷入“保增长”与“促减排”的两难困境;而清洁能源替代、碳捕集技术研发、工业流程改造等低碳转型措施需要持续投入巨额资金。

绿色金融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通过为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和风险管理等提供金融服务,可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重塑企业行为模式与市场运行规则。基于此,本文将深入分析绿色金融的运行机制及其助推低碳经济转型发展的路径,旨在为构建高效、包容、稳定的绿色金融生态系统提供新思路。

资金直接支持低碳项目

绿色金融机构设计的专项贷款和绿色债券门槛低、周期长、利率灵活,可为技术成熟但启动资金不足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从而促进清洁能源、节能技术、低碳交通等领域的发展。这一过程中,银行和投资机构简化审批流程,减少抵押担保要求,使得中小企业能够更容易获得资金支持;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设立风险补偿基金分担了部分贷款损失风险。资金到位后,项目方快速采购设备、建设基础设施、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加速技术商业化进程。而为保障资金使用效率和透明度,金融机构还建立了全流程监管体系,要求项目方定期提交资金使用报告和减排数据。

对于减排效果显著、技术稳定的项目,金融机构增加了后续贷款额度。对于进展缓慢、数据不达标企业,则暂停拨款并要求企业进行整改,以此来提高资金的使用率,避免资源浪费。

此外,政府也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通过推动绿色金融产品标准化,明确资金用途、评估标准和回报规则增强了投资者信心,从而吸引了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低碳投资,进一步助推了低碳项目开展。

政策激励引导企业转型

在绿色金融助推低碳经济转型发展的过程中,政策激励至关重要,多地政府都根据企业实际减排量动态调整所得税率,企业减排量越大,税率降幅越明显,零排放企业则可以享受全额免税的优惠。政府还为购置节能设备、改造生产线、投资清洁能源的企业提供了专项补贴,补贴可抵扣部分设备采购费用。对于高污染行业企业,政府实施了强制性排放标准,超限额的企业必须缴纳阶梯式环境税,税额随超标比例递增。而对长期无法达标的企业,实施限产、停产整改措施,以此来推动企业主动调整生产模式。

金融机构与政策形成联动,银行负责开发定向绿色信贷产品,对符合环保标准的企业提供长期低息贷款,缓解其资金周转压力;保险机构设计并推出了气候风险保障产品,为企业因技术故障、自然灾害等因素导致的转型损失提供了补偿,从而增强了企业抗风险能力。监管部门则负责发布行业减排技术指南,明确不同阶段的改造目标和验收标准,帮助企业制定可执行的转型计划。政府定期公开各行业碳排放数据排名,对领先企业给予公开表彰和额外政策倾斜,形成行业竞争氛围,从而激励企业主动优化生产工艺、加大低碳技术研发投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

建立碳交易市场体系

政府为不同行业设定年度碳排放总量上限,并向企业分配碳排放配额,配额分为免费发放和付费购买两种形式。企业实际排放量低于配额,可将剩余配额出售获利。而如果排放量超出了配额,则需从市场购买额外配额补齐缺口,通过将碳排放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的商品,促使企业通过技术升级、能源替代等方式降低排放成本。

碳交易市场覆盖电力、钢铁、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后逐步扩展至交通、建筑等领域,不同领域的企业开始互相影响。物流公司改用电动车降低排放,省下的碳配额可以卖给建材厂,建筑工地使用节能材料减少污染,又能带动钢铁厂研发低碳产品。

政府还搭建了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平台,实时记录企业碳排放数据和配额交易信息,并且还引入了第三方机构独立核查企业排放报告,防止数据虚报以及造假。政府要求专业机构每年对企业报告进行审查,发现造假将严格处罚。碳交易平台会公开配额价格、成交量、历史趋势等与交易有关的信息,保障买卖双方信息对称。

金融机构开发了碳金融产品,包括碳期货、碳保险,帮助企业锁定未来碳价,降低市场波动风险。政府则定期调整行业配额总量,逐年收紧排放上限,以此来倒逼企业提高减排效率。碳交易市场与绿色金融、政策激励形成互补,引导资源向低碳领域流动,最终实现全产业链的绿色转型。

绿色金融作为低碳经济转型的核心驱动力,通过绿色信贷、碳交易市场、绿色债券等工具能够精准引导资本流向清洁能源、节能技术和生态修复领域,助力低碳发展。政府通过完善绿色金融标准,强化信息披露机制逐步构建起市场激励与制度约束并行的运行框架。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加速淘汰落后产能,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减排即收益”的良性循环。未来,绿色金融的深化发展需建立全球统一的碳核算与认证体系,提升市场透明度。同时,利用区块链、人工智能降低监管与交易成本,转化为全球低碳转型的持久动力。

(作者系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绿色金融助推低碳经济转型发展

□ 李嘉楠

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自信自立自强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文化自信自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动力源泉,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坚持以文铸魂,以地域文化为起点,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必将为辽宁全面振兴汇聚强大文化凝聚力。

辽宁地域文化延续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

中华文明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变迁史,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在此进程中,辽宁始终扮演重要角色。作为中原汉族与东北少数民族交流的主要通道,辽宁地区积淀了深厚且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既有挺立千百年文化遗存,如世界文化遗产沈阳“一宫三陵”、葫芦岛九门口长城等,又有凝炼在人民日常生活中亟待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满族刺绣、辽西太平鼓等。目前,辽宁共拥有国家级非遗项目76项、省级非遗项目218项。这些历经风霜留给辽宁的宝贵财富,不仅体现了辽宁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也让辽宁人民更有归属感,成为推动辽宁全面振兴文化凝聚力的重要源泉。

辽宁地域文化蕴含着革命文化的内涵

革命文化标注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文化自信和精神力量。辽宁革命历史厚重,红色“六地”文化深入人心。东北抗联在杨靖宇将军的带领下,穿插于辽宁的重峦叠嶂中奋勇抗日;滚滚流淌的鸭绿江水,见证了抗美援朝将士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也诉说着对英灵的思念。这些革命文化,记录着中华儿女砥砺奋进的伟大征程,是激励辽宁人民拼搏奋进的坚强动力。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必将凝聚起辽宁全面振兴更磅礴的精神力量。

辽宁地域文化复刻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印迹

辽宁工业文化的形成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进程的缩影。作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辽宁是1000个新中国工业史上第一纪录的创造者。“一五”计划期间,辽宁承担了国家1/6的重点项目,积极供应全国资源、支援三线建设,为我国国防工业建设和国家工业整体布局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即便20世纪90年代受下岗潮影响,辽宁在短暂彷徨后迅速恢复斗志,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不放弃工业科技领域的自我突破,确立了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重大技术创新策源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新高地的战略目标。

辽宁工业文化积淀过程中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创新精神、奉献精神,为新时代推动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提供了思想源泉,是辽宁全面振兴不可或缺

的精神动力。

辽宁地域文化创新着弘扬时代文化的方式

传承和发扬辽宁地域文化,对于弘扬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文化、增强文化自信自强意义重大。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两个创新”,让辽宁地域文化焕发时代光彩。

一方面,创新传承辽宁地域文化的政策措施。

一是推进社会组织参与保护传承。持续探索公私合营模式,与企业合作共同开发物质文化遗产。例如,兴城古城通过公私合营,在遗址的保护修缮、文化符号的开发推广上取得了质的飞跃,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供了新动力。

二是推进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基金建立。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需要充足的资金保障。省内相关项目争取专项基金的主要渠道是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还未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基金,亟需完善。

三是推进“非遗文化进课堂”。辽宁省已将非遗文化项目纳入中小学学生课本课程。后续应开设专门课程、邀请本地非遗传承人进校园,通过现场展示、互动体验,推动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另一方面,创新辽宁地域文化的传播方式。

一是拓展“文化+科技”应用范围。辽宁文旅集团携手数字显示领域全球领先国企精心打造的“醉·辽宁”艺云数字艺术中

心,借助光电交互技术突破时空限制,追溯辽宁深厚文脉;其户外沉浸式空间、裸眼3D视觉内容和光影融合数字技术,通过扫码、触屏、刷屏运营,实现行人与屏幕互动、室内外沉浸式空间联动,提升沉浸式消费体验的同时为推进“文化+科技”发展拓宽了思路。

二是拓展文化传播的平台路径。在自媒体时代,把握新时代受众的信息获取习惯,拓宽文化传播平台路径,让本土文化进入公众视野,获得更大宣传效益。例如,绥中文旅官方抖音号,对绥中庆元宵“非遗贺春·乐享山海”活动进行了短视频宣传,让绥中文旅成为同时段葫芦岛地区文旅官方号间的“顶流”。“酒香也怕巷子深”,要尽可能扩宽文化传播平台路径,使更多目光凝聚到辽宁本土文化上。

三是拓展国际文化交流渠道。辽宁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民族交流、互通共荣的重要地区。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一带一路”向前推进,辽宁省着力打造对外开放“强磁场”,国际间合作不局限于经济领域,与周边邻国在文化交往上愈发密切。辽宁省率先推出“非遗+芭蕾”模式,将本土非遗带上了俄罗斯舞台;过境免签政策实施后,各大社交软件上常能看到国外博主自发宣传,成为辽宁国际宣传的“自来水”。2024年,沈阳首次获批“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对辽宁振兴来讲举足轻重。后续要采取有力措施,让这一地位落到实处,并在国际文化交流上继续探索,持续提升辽宁国际文化形象。

(作者系中共葫芦岛市委党校副教授)

知行合一:经管专业与“实践育人”深度融合

□ 崔婷婷 何志杰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管类人才面临的伦理挑战日益复杂,高等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亟需在专业教育中筑牢学生的价值防线。然而,传统思政教育往往停留在课堂说教层面,学生难以将道德认知转化为职业行为。对于学习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来说,商业决策中的道德抉择发生在具体情境中,现有课程体系虽增加了思政元素,但多数只是把这些内容像零散的知识点一样加进课本里,并没有教学生如何在实际工作中一步步运用这些道德原则,导致学生在实习和就业过程中因缺乏清晰的指导和处理经验做出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基于此,本文将探索经管专业思政教育落地生根的核心路径,为破解思政教育困境提供新思路,培养兼具商业智慧与道德底线的经营人才。

深化课程实践环节设计

强化知行合一

经管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中,课程实践设计应将价值理念自然融入专业技能训

练,财务分析实验可加入职业道德反思环节,市场营销策划考虑诚信经营指标,让学生在动手操作过程中直接感受到专业技术和道德选择的紧密联系。

教师应在小组讨论和方案调试中设置关键提问节点,当学生面对决策矛盾时,引导他们思考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平衡,过程中多用启发式提问。课程结束后学生需撰写实践报告,记录操作中遇到的价值冲突及解决过程,这些记录既用于过程评价,也能够帮助教师开展个性化指导。实践环境要尽可能模拟真实商业场景,让学生在面临利益选择时自然做出价值判断。价值观考核随着任务难度同步深化,专业导师负责技术指导,思政导师提供价值分析框架,双方定期对照学生在技能操作和价值认知方面的成长。

同时,在实践成果展示环节增加价值答辩模块,要求学生解释方案中的社会责任逻辑,由企业专家和学校教师共同检验知行合一的程度。实践手册每年更新价值观察指标,确保评价数据与行业发展同步。这样,学生将能够在反复训练中逐步形成条件反射式的职业道德判断力,从而真正实现知行合一的教育目标。

构建多元协同评价体系

推动评价主体共治

经管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中“实践育人”目标的实现也要求教师构建多元评价体系,这需要教师、企业导师、学生共同参与。其中,教师重点评价课堂实践中的学生的价值判断逻辑是否正确,观察学生解决专业问题时体现的责任意识;企业导师负责评估职业行为与社会需求的匹配度,记录学生在真实工作场景中的道德表现;学生则进行自我评价,使用标准化反思量表定期记录对职业道德的认知变化。学生之间互评,对小组成员在诚信守时、团队协作等方面的表现进行客观描述,评价结果通过数字平台实时汇总,自动生成个人思政能力发展曲线图,为思政教育的个性化改进和精准化提升提供科学依据。

教师还应当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建立终身实践档案,所有评价数据都要进行加密存储,保障数据的真实性、可查性。同时,还要将爱国情怀、法治意识等抽象概念转化为可观测的行为指标,以此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化成长。